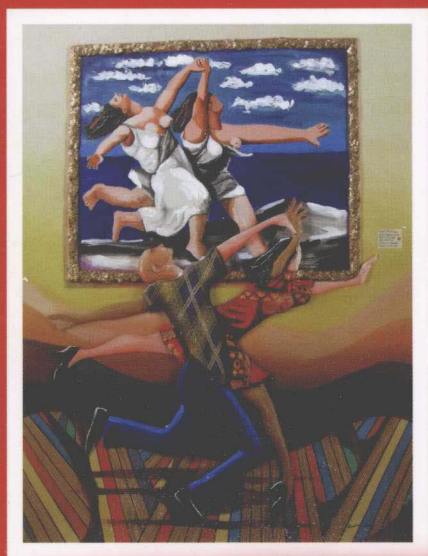


LUC FERRY

Qu'est-ce qu'une
vie réussie ?



什么是好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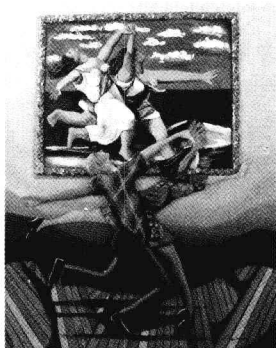
[法] 吕克·费希 著

黄迪娜 许世鹏 吴晓斐 译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LUC FERRY

Qu'est-ce qu'une
vie réussie ?



什么是好生活

[法] 吕克·费希 著

黄迪娜 许世鹏 吴晓斐 译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什么是好生活 / (法) 费希著; 黄迪娜, 吴晓斐译.
—长春: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10.10
ISBN 978-7-5463-3900-9

I. ①什… II. ①费… ②黄… ③吴… III. ①生命哲学 IV. ①B08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202370号

什么是好生活

-
- | | |
|------|-------------------|
| 作 者 | [法]吕克·费希 |
| 译 者 | 黄迪娜 吴晓斐 译 |
| 出 品 | 吉林出版集团·北京汉阅传播 |
| 策划编辑 | 严搏非 |
| 责任编辑 | 武 学 |
| 装帧设计 | 林 涛 秦 巍 |
| 开 本 | 880mm×1230mm 1/32 |
| 印 张 | 11 |
| 版 次 | 2010年10月第1版 |
| 印 次 | 2010年10月第1次印刷 |
-
- | | |
|-----|---|
| 出 版 |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
| 发 行 | 北京吉版图书有限责任公司 |
| 地 址 | 北京市宣武区椿树园15-18号底商A222
邮编: 100052 |
| 电 话 | 总编办: 010-63103398
发行部: 010-63104979 |
| 网 址 | http://www.jlpg-bj.com/ |
| 印 刷 | 北京同文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
-

ISBN 978-7-5463-3900-9 定价 32.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谨以此书

献给我的爱妻玛丽·卡罗琳 (Marie-Caroline), “matao”

序 言

我们的白日梦： 成功，倦怠，以及嫉妒

我的名字叫亨利
我渴望过上幸福的生活，有人关爱
事事顺利，挣很多钱，
尤其是要聪明机灵
可为此我得没日没夜地干活……

——丹尼尔·巴拉伐〔1〕

在1908年出版的一篇简短的演说稿“创作家与白日梦”中，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对人们精神生活中一个看似妙趣横生的方面进行了大胆的意义解读，认为它们是幻想有时构筑的“白日梦”和“西班牙城堡”，以补偿现实生活给我们造成的挫折感。这些遐思迩想的小场景通常投射在一个三维时空里；承认当前的困窘境遇，追溯过去

〔1〕 20世纪七八十年代法国著名歌星丹尼尔·巴拉伐的一首歌曲。——译者注。

寻求素材进行巧妙改造,从而勾画出一个锦绣未来的轮廓。为阐明这一主题,弗洛伊德请我们思考如下特意为此虚构的故事:

假设有一个穷苦的孤儿,你给了他某个雇主的地址,在那儿他兴许能找到一份工作。在前往雇主家的途中,小男孩便可能沉浸在一个合乎当前情景并由此产生的白日梦当中。其幻想的内容也许会是这样的:他得到一份差事,而且深得新雇主欢心,逐渐成为后者生意上的左膀右臂,为雇主的家庭所接纳,娶了这家年轻漂亮的女儿,尔后自己当上了企业的董事,先是作为雇主的合伙人,然后做他的继承人。在这一幻想中,幻想者重新获得了自己在快乐的童年时期所拥有的东西——为他遮风避雨的家庭,慈爱的父母,以及他最初寄予深情的种种对象。从此例中,我们可以看到,愿望是如何利用目前的一个场合,按照过去的样式,描绘出一幅将来的画面。〔2〕

这个小故事略显空洞,弗洛伊德本人也愿意承认这一点。他既不是作家亦不是诗人,这个故事不过是一个即兴拼凑的画面罢了。其中他对自己那个时代的小男孩所赋予的幻想在今天看来也不免陈旧,但只需抱着些许善意,我们便完全能够理解他的意思。假若我们稍微加以修正,抑或按照时下的习俗稍做调整,就不难发现自己也身处同样的境地。不论我们承认与否,在那早已过去的青少年时期,我们都曾不止一次地陷入弗洛伊德所描述的白日梦中。无数电影和小

〔2〕 参见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创作家与白日梦”,收录于詹姆斯·斯特拉奇与安娜·弗洛伊德共同主编、阿力克斯·斯特雷奇及艾伦·泰森协同编译的《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心理学全集》(伦敦:荷加斯出版社(Hogarth Press)和精神分析协会,1959年版)一书第9卷,第143-153页,引文见第148页。法文版见 Marie Bonaparte and Mme E. Marty, ‘La création littéraire et le rêve éveillé,’ in *Essais de psychanalyse appliquée*. Coll. Idées (Paris: Gallimard, 1933, 1971), 75.

说的成功（它们甚至形成了自己的文学流派）使得这一点毋庸置疑。不错，正像弗洛伊德英明指出的，承认这些幻想带有某种奇怪的、根深蒂固的羞耻感。

我们宁可坦白自己犯下的最不可饶恕的错误，也不愿公开展现我们的隐秘幻想，尽管一切都表明幻想纵然不算是普遍现象，也颇为常见。它们对应的标准再通俗不过了，所属类型亦简单明了、易于概括。首先是“拥有”（possession）的梦，其原型就是拉·封丹笔下的佩雷特，她是一名挤奶女工，正憧憬着怎么花掉卖牛奶得来的钱，就在此时她失手摔碎了奶罐，牛奶洒了，梦想亦随之破灭。^{〔3〕}如果我们能中六合彩，从失散已久的叔叔那儿继承一笔丰厚的财产，凡此种，我们也会买进成群的鸡鸭牛羊——说得更贴切些，会买车、买游艇，在郊外、海边甚或山林里购置别墅——没准儿还不忘接济（虽然不会太多）兄弟姐妹、七姑八嫂和慈善机构呢。其次是“矫正”（rectification）的梦。当我们在争论中畏首畏尾，未能在辩论中进行有力反击的时候，当我们在谈话中突然思维枯竭的时候，或是当自己的行为有失体面的时候，白日梦为我们在现实生活中所亟需之事物提供了一种无懈可击的修复方式。第三种类型的梦涉及“诱惑”（seduction）的典型。在这里，我们终于被赋予某些卓绝不群的才能：我们是艺术大师，完美无瑕地演奏着一件乐器，而事实上到目前为止我们只能让它发出刺耳的吱吱声；我们成了实际上自己正准备灰心放弃的某个运动项目的冠军；我们从此向他人展示着出人意料的幽默、美丽与智慧，同时还谦逊有礼（这就更具有讽刺意味了），甚至到了谦卑的地步，这些特质令世人激赏，使我们的非凡才华显得更加耀眼。

〔3〕 参见 Jean de La Fontaine, “La Laitière et le Pot au Lait,” *Fable*, (Paris: Garnier, 1960), X, Livre VII, pp. 165 - 166.

还有一种是关于“性爱”(erotic)的梦,出自性欲或爱情的。这种类型的幻想包括“真爱”以及补上“白马王子”和“蛇蝎美人”。至此我们已经差不多把自己的想象力囊括在“社会成功”的领域里了。那么,我们为何如此地羞于承认这些渴望呢?

有某些“正当的理由”——往往都是最坏的理由——却也不乏趣味。第一,众所周知,白日做梦在很大程度上显得幼稚无知。据我们日常所见,孩子们非常善于运用想象来进行幻想游戏:他们不断为自己创造出绝妙无比的世界,对此他们专心致志,倾注了极大的热情。正如弗洛伊德强调的那样,游戏的对立面是现实生活,而非严肃认真。不过,我们需要再补充一点,孩子们有借口做白日梦,成人却遗憾地失去了这些借口:孩子们在扮“大人”——医生、飞行员、火车司机,还有赛车手——要不就是洋洋得意地当上了泰迪熊和玩具娃娃的爸爸妈妈。他们这么做的时候,我们愉快地认定其行为“合情合理”,换言之,既然孩子们总归要“长大成人”,幻想就与他们作为孩童的身份相符。在成人那里,这种特权则大多被抑制了。

第二,在成人身上,做白日梦的幼稚总与某种不宜公开表露的自我主义,甚至利己主义相联系。白日梦的一个最为持久和明显的特征就是,我们自己始终是其中的主角,是故事的核心人物,万众瞩目的焦点,势不可挡的胜利者,即使面临最严峻的考验也岿然不动的中流砥柱。同样,有不少文学作品直接与之呼应:在这一章的结尾,加斯顿·勒鲁(Gaston Leroux)所塑造的侦探英雄勒鲁达比身陷河底,被沉重的铁链牢牢锁住。读者们却丝毫不用担心,因为我们知道下一个情节即将展开:“勒鲁达比爬上了河岸……”现实生活对我们亲爱的“自我”则肯定没这么友好。

这一心理活动的第三个特性更为微妙地促使我们不愿意开诚布公。有做白日梦的需要意味着我们承认,哪怕只是暗示,自己在这个

常常背离我们愿望的现实世界中的种种不幸。从经验中我们得知，让他人知道我们属于那种不为人妒忌也不值得羡慕的“失落者”并不是件受人欢迎的事情。也正因为如此——最后，但不是最重要的一点——在某些情况下做白日梦被认为是精神病的早期症状。如果说与现实脱节是精神错乱的一个主要征兆，那么构筑“西班牙城堡”，尤其是当它变成成年人身上一项生机勃勃且不断扩张的活动时，就会被视作濒临神经病边缘的行为。

心理学教科书向世人提供了关于神经病与精神病区别的著名定义。它告诉我们，精神病患者坚定不移地相信二加二等于五。任何试图说服他们得出其他答案的人在他们眼里均是图谋不轨的坏蛋。精神病患者已经脱离了现实。神经病患者也相信二加二等于五，但与精神病患者不同的是，他们为此深受困扰。神经病患者仍然与现实世界保持着联系，哪怕只是通过焦虑。有一则逸闻（我想它是一个德国人创作的）以笑话的形式表达了同样的内容，作者借用白日梦的原型也并非纯属偶然：一个神经病在西班牙构建了一座城堡，精神病患者就住在里面（这一情形显然更令人遗憾），精神病医生盗取了租金！

难道我们就这样向疯狂屈服？强烈渴望以白日梦的方式幻想自己如何在生活中大有作为之时，有没有可能我们正蹒跚在精神错乱的边缘？也许有人认为这是个毫无价值的问题。他们也许会说，对“好生活”的探询从古希腊时期以来哲学的宏大历史中可得到见证，此问题过于严肃，无法轻而易举得到解决，或是用如此明显的“心理分析”的方法加以解决。对此我深以为然。弗洛伊德的上述奇思妙想似乎堪承当代最为深奥和最具哲理性的特征：古代人——回到他们那个时代——所谓“圆满生活”与今天单纯的“社会成功”之间的混淆；真正的才智与基于对权力、金钱及赞誉的自我陶醉和永无止境

的追求而为了表现本身“追捧绩效”〔4〕之间的混乱,若非如此,我几乎也已经放弃了对这一主题的探究。卢梭对于在自己眼前成形的现代世界并不热衷,他宣称,个体的不幸来源于这样的事实:他们与别人在一起时是孤独的,他们孤独时与别人在一起。〔5〕因为决然投身普世竞争的大潮,他们是孤立的;他们亦彼此紧密相连,由于竞争的需要所产生的不可避免的挫折感,他们需要沉浸在幻想中补偿自己。这一评论意味深长。

我们还必须了解,为什么简单的“成功”——被简化为仅看表现、只重权力,而无助于我们达到真正值得称许的目标的成功——往往成了我们思索并渴望的终极目标,就像在白日梦中那样。也正是出于类似的原因,我们有些羞于承认这一点。或许有人会说,并非人人如此:聪明人力图满足于自己已经拥有的;社会成功之外也还存在着其他的价值取向。这也不无道理。是的,当然,在后文中我们还会回到这个话题上。然而,我们不应该低估人类潜意识的可怕迂回。放弃白日梦所显露的幼稚想象也意味着向克己的思维方式妥协,但究其本质而言,后者与“成功”的思维方式一样含混不清、令人生疑。著名的拉·封丹又一次一语中的:佩雷特的故事与那个狐狸和葡萄的故事遥相呼应。当事实证明狐狸再怎么费尽心机也吃不到香甜的葡萄之后,它便断定那葡萄“酸透了”、“只有蠢材才吃哩”。〔6〕

不妨承认事实吧:出于某些无法逃避的原因,现代世界经常激发人们的白日梦。光鲜夺目的明星和闪亮饰品扑面而来,强权面前卑

〔4〕 这一说法取自 Alan Ehrenberg, *Le culte et la performance* (Paris: Calmann-Lévy, 1991).

〔5〕 此处我援引的是皮埃尔·玛内评注中的卢梭名句(其引文是否精确我并不知道),参阅 Pierre Manent, *Cours familier de philosophie politique* (Paris: Fayard, 2001).

〔6〕 La Fontaine, “Le Renard et les raisins,” *Fable*, XI, Livre III, p. 80.

躬屈膝的文化氛围，以及对金钱毫无节制的崇拜，都容易致使白日梦成为一种生活模式。不进则出，不上即下，成王败寇，要么十全十美要么粉身碎骨……现如今每一件事情都要求我们成功——为了成功而成功——在所有可以想见的领域里做一个完美典型。体育、艺术、科学、政治、商业、爱情——无所不包，而没有价值的高低贵贱之分。正如费德里科·费里尼执导的电影《舞国》（*Ginger e Fred*）里所描述的著名电视节目那样，舞者的每一次表演都必须令人叹服，堪称吉尼斯世界纪录里的典范。不论行为主体是医生、音乐家、无业游民抑或足球运动员，均是如此。于是乎，对成功的迫切渴求似乎成了一种指摘他人的新方式：“失败者”永远是无名小卒。

总之，“成功”这一概念看起来颇具争议。以它为标准评价生命这一整体难道不会有失偏颇，甚至谬误百出？一味地以一种更适合于期末考试而非塑造美好生活的方式看待生命难道不是稚拙而且错误的做法？以为我们能像烘烤蛋奶酥或燉牛肉那样成功地炮制出幸福生活，尤其是认为我们周遭所有的一切并不取决于我们自己，而要倚赖于出身的高低贵贱、纯粹偶然的事件、甚或福运与灾祸的突然降临，莫非不是极其狂妄的想法？我们是否对闷闷不乐的“自我”寄予了过高的期望，或者让本该在剧中跑龙套的“自由意志”担任了主角？然而，事实却依旧如此：社会“成功”的幻影、围绕自我奋斗成功之人的神话和权力的假象所产生的狂想如此之强烈，它们几乎无所不在，以至于遮住了我们的视线。在盛邀我们自由行动和自我实现的名义下，我们的白日梦和当今世界的绩效崇拜以及对其寄予厚望、并为之付出如此沉重代价的“成功”理想，难道不是正在迅速形成一种新型暴政？！

兴许有人会宿命地认为对成功的追寻是人类境况的一个根本方面，是社会历史中一直存在的一个重要的外在特征。的确如此。可

我们必须警惕不合时宜的看法和所谓公认的观念,它们可能会有碍于我们领会人类现状中某些异乎寻常之处。要理解“好生活”这一问题今天是如何通过既新颖又不无疑义的方式提出来的,就必须考察这一现状。

“好生活”还是“成功的生活”?

自我超越的晦暗与现代人的生存条件

古往今来,至少自古典哲学诞生以来,对“好生活”这一问题的探询主要就在于寻求一种可允许人类正视其独一无二的存在价值的先验(transcendent)准则——某种外在于人性且高于人性的存在。要评价一个人的生活成功与否,要分辨其生命是否有所价值,以及它是否“得救”了,必须有一个超越人类的标准,一种高于一切的衡量尺度,借此可对世人进行或多或少客观的判断。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宏大的世界观开始主宰人类,尽管这些观念无疑都是人类自己锻造出来的:每一个人都应当在和谐的宇宙秩序中各司其职、各安其位;仁慈的上帝会用他的爱指引我们每个人的生活。诸如此类的观念不仅将人们紧密联系起来,更使他们效忠于在他们看来远比表现本身更重要的深远价值和目的。

直至离我们较近的年代,即使在有意识的唯物主义观念里,对超越个体的先验准则和宗教意义上可疑的救赎之诉求依然主导着人类世界。这一立场甚至在诠释了信念之真髓的革命主义意识形态中得到了表达:通过使个人的生命遵从于——必要时献身于——某一理想,人们可以确信自己因为最终获得了永恒而被“救赎”了(从字面上讲)。在乔万尼·卡雷斯奇(Giovanni Guareschi)的作品《卡米洛的小小世界》中,顿·卡米洛(Don Camillo)是一名精力充沛的教区牧

师，派鹏（Peppone）则是那个小城市的市长、一名共产主义者，虽然二人总是针锋相对，但他们仍会一起到街头散步。于是，当死亡打破了一位盖世英雄的命运、并向我们提出关于其生命的终极意义这一问题时，上述世俗信念的某些无知印迹便显露出来。这也绝非偶然。斯大林去世后，法国共产党主编的周报《新法国》在头版刊登了一篇传记，现在看来这篇传记相当令人震惊，然而它完美地传达了政治信仰的宗教（甚或原教旨主义）本性：

斯大林，列宁同志的杰出战友和伟大接班人，全世界劳动者的领袖、朋友和兄弟，心脏停止了跳动。但是斯大林主义还活着；它将永垂不朽。这位世界共产主义的天才导师的崇高名誉将世代闪耀着光芒，将始终被感激涕零、满怀敬意地称颂。我们将永远对斯大林保持忠诚。共产主义者将不屈不挠地致力于工人阶级的神圣事业……不辱没斯大林主义这一可敬的称号。永远向伟大的斯大林致敬，他不朽的权威学术著作将指引我们团结起大多数人民……（原文如此）〔7〕

时至今日，古巴的国歌依旧显示出这一无神宗教的最后残余，它把救赎的希望扩展至普通民众身上，要求后者愿意为了最高事业牺牲个人的命运，因为“为国捐躯即意味着永生”。

这一切尽管在时间上离我们如此之近，但它却带有某种奇怪的古老色调。我们能从中看到整体论（integralism）乃至神秘谵妄的影子，而绝非真正的所谓政治分析。欧洲无疑已经进入一个彻底政教分离（或者，也许你更愿意说它是激进的唯物主义）的新时代，事实

〔7〕 *France Nouvelle*, 14 March 1953, p. 1. The front page of *France Nouvelle* for this date is reproduced in Michel - Antoine Burnier, *Histoire illustrée du socialisme (1830 - 1981)*, rev. ed. (Paris: Jannineck, 1981), 81.

上,对大多数人而言,再也没有什么是真正“超越人类”的了。“人”成为其自身存在的全部,对往昔的超验——宇宙抑或上帝,连同“祖国”和“革命”——似乎都显得虚幻之极,甚至完全是专断和致命的。当然,仍有人保留着信仰,然而信徒的数量已日渐稀少,而对于其他所有人来说,死亡从此没有了“原因”,没有神的召唤,也不再有“来生”——正因为如此,人类社会总是无法抗拒地遮蔽着死亡。

大致上,我们可以认为当今世界(至少在西方民主国家)^{〔8〕}最大的特征之一就是,大多数人坚信生命的得失成败不再由任何先验的标准来评判,尽管对此的反应因人而异,有人欢呼有人忧虑。一个极为重要的后果便是,诚如尼采所看到的那样(在这方面,他是现代首位、也是影响最深远的哲学家):人们判断一个存在物的生命在多大程度上“取得成功”或“令人羡慕”,多大程度上善感而富足,又在多大程度上不虚此生,或者与此相反,生命在多大程度上是平庸和颓丧的,均要从现实生活的内部出发,而不能脱离人类切身体验的范围,抑或转向某些高高在上的原则。有鉴于此,毫无疑问,对我们关于“好生活”之追问的第一个回应就体现了白日梦的逻辑:倘使不再有“超越”之说,那我们为什么不能为了绩效而激励绩效,为了成功而培植成功,寻求成功的生活而不是好生活,活在当下而非纯属假设的“来世”呢?

海德格尔为我们提供了理解上述——考虑到它既非逸闻趣话,也非暂时的现象,我们不妨套用黑格尔的说法,将其称之为“世界历史”(world - historical)——变化的新视角,传统意义上对“世界觉

〔8〕 我们必须做如下假设:欧洲大陆已由曾经的基督教民族聚集地变成一个世俗风行之地,从某种意义上讲,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寻求超越宗教之基准的世界。也正因为如此,关于好生活的问题在欧洲在新的条件下提出来了。但是这决不当妨碍我们充分考虑欧洲以外的传统,本书中这些传统将经常被提及。

醒”、“意识形态的终结”或“乌托邦的消失”等的论述都难以望其项背。这一变化值得我们花时间精心领会和深入思考。

表现崇拜,技术世界,以及意义问题的清理

在《克服形而上学》一文中,海德格尔概括了现代世界在经历了哪些阶段之后走上一条全新的道路,于生命的诸多可能性中赋予“权力意志”〔9〕至高无上的地位,进而将对权力的热衷从过去它可能所服务的更高目的中分离出来。不难想见,这便是海德格尔所说的“技术世界”。技术其实是一个典型的“作为工具的”理由,同样是一种手段因素,不论其目的为何。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可以说,譬如,一名“好医疗技师”(他可以是好医师,也可以不是)就是能够轻易地治愈或者治死患者的医师。由此看来,技术就等同于力量;就是为了权力而追求权力,而根本无需考虑其目标的合法性。海德格尔阐释了这样一个世界的诞生:技术规则锋芒毕露,不但与传统的科学概念(确切地说,科学不能够被简化为仅仅是工具)分道扬镳,更与人类生命的目的彻底决裂,在政治领域尤其如此。

我们不妨简要回顾一下这几个阶段。随着以笛卡尔之名(姑且不论其对错与否)为标志的现代科学的兴盛,出现了一种此前根本无法想象的支配物质世界的计划。用笛卡尔那闻名遐迩的惯用表述来说,这一计划使人类成了“自然界的主人和占有者”〔10〕。不过,更准确地说,我们还应该补充说,支配有两种形式。

〔9〕 下文中我们将看到,权力意志在尼采这里有着特殊的意义,不能被简化为仅仅是占有力量的欲望。

〔10〕 参见 René Descartes, *Discourse on Method and Meditations on First Philosophy*, ed. David Weissman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t. 5, p. 38.

首先,在理论或知识层面,支配表现为对事物的基本认知。随着现代物理学(亦即“机械论”)的诞生,自然界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不再被看作一个诡秘莫测的存在,一个具有“神秘品性”的“庞然生物体”,其背后隐藏着无形的、超自然的力量,这些力量只有通过炼金术、宗教甚或巫术才能够看透并在某种程度上得以理通。从这个意义上说,尽管笛卡尔的科学论谬误百出,但他仍然是现代理性主义名副其实的奠基人。笛卡尔假定宇宙中任何变化都不会无缘无故地发生(惯性原理),他抛却了从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和中世纪的万物有灵论衍生而来的古宇宙论。如果说自然界正在失去其模糊与玄奥,那是因为,从此以后科学家们都开始认为自然及其组成部分都与自己的认知协调一致。鉴于科学是一个永无止境的探索过程,二者的一致性不一定表现为事实上的雷同,而应当体现在法则上。现代科学伴随着这样的信念而生:物质世界的混浊既非确乎不移,也不是客观现实的本来面目;它只不过反应了人类对某些领域的无知,而从原则上讲,无知的范围可以被无限地缩小。

其次,与上述通过(数学、物理、生物等)理论统治宇宙的观点相对应的,是对自然界的“实际”支配(这一理论与实践的两面性就如同人的主体性的两个基本属性——认知与意志)。被视为剥除了所有内在价值与意义的原材料之后,自然界便成了一个巨大的贮藏所,人类可随意利用其中的物质来取悦自己。整个世界都属于他们,万物不过是帮助某一真正拥有无限权力的主体实现其目标的工具罢了。简言之,倘若从理论上讲宇宙是可以估量和预见的,那么在实践层面它就是可被操控并随时大肆开发的。

对世界的这一“支配观”在启蒙运动中达到了顶峰,继而在19世纪广泛流传开来,但这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技术世界”——换句话说,它还不算是一个对目标的考虑完全让位于工具本身的世界。

在17—18世纪的理性主义语境下，通过科学研究掌握自然世界进而支配人类社会的设想还带有某种解放性的目的：从原则上讲，它仍要服从于某些看起来远比它更高级的目标的实现。倘若其寓意在于将宇宙“据为己有”，这种占有也并非仅仅来源于对人类自身力量的痴迷，更不是为了摆弄权力，而是为了达成“自由”、“幸福”等目标。启蒙哲学家们称之为“进步”。此外，也正因为有了这些更高的目的，科学的发展似乎才成了“文明”的一个矢量。对理性作用的这一看法是否虚妄并不是本书讨论的重点。关键在于这种看法显然还与某些外在于其自身的目标紧密相连，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也不能被简化为一个纯粹工具或者技术的理性。

另一方面，技术世界则是一个出于工具理由彻底放弃决定目的之“目标”的世界，其特点是只关心生产、效率和成绩。说得更准确些，它唯一的目标（如果还能称其为目标的话）就是手段本身的强化。例如，一个以竞争原则为基础的全球化自由经济体系，从不容许人们停下来思考生产力不断扩大的最终结果到底是什么。我们必须——不论发生什么，也不管付出多大代价——为了发展而发展，要么前进要么毁灭，没有人能确实告诉我们发展本身——也就是工具力量的增强——是否能像过去那样给我们带来更多的福祉和自由。今天的生态学者对此深表怀疑。18世纪的浪漫派们也有其自己的疑虑。

在此一新的远景下，世界就好比是一个陀螺，必须不停地转动才不致倒下，而不带有任何其他目的。转动成了其本质。接下来我们对这一比喻稍作阐述。在全球竞争的经济形势下，发展就如同一种需求：一个未能与他者抗衡以求不断发展的企业，必定会很快销声匿迹。换言之，与陀螺一样，进化也未必能称其为发展，原因既简单又合理：当进化被剥离了目的性（虽然谈不上被切除了大脑），对它进行评估的外部标准。就不复存在从此以后它只取决于“动力因”